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通讯

二〇一〇年第一期（总第4期）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

<http://www.lib.szu.edu.cn>

深圳大学图书馆印度文献资料室

E-mail:szucis@yahoo.com.cn

2010年6月1日

本期要目

印度新任驻华大使苏杰生博士一行访问我校

印度新任驻穗总领事潘迪先生一行访问我校

第二届“中国-南亚国际文化论坛”在印度新德里成功举行
记第二届“中国-印度论坛”

谭云山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传记电影文学剧本《谭云山》解说词

重温历史 发展友谊——电影文学剧本《谭云山》创作谈

佛陀智慧：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祝贺洛阳白马寺印度佛殿落成

用心经营事业与爱情——记鲍思岱、朱新天访问深圳大学

加尔各答之行

印度的中国学概览

中国人眼中的印度

谭云山文献及研究专栏

观光祖国诗三篇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通讯

二〇一〇年第一期（总第4期）

主编：郁龙余

执行编辑：黄蓉 朱璇

目 录

印度新任驻华大使苏杰生博士一行访问我校.....	4
印度新任驻穗总领事潘迪先生一行访问我校.....	4
第二届“中国—南亚国际文化论坛”在印度新德里成功举行.....	5
记第二届“中国—印度论坛”.....	6
谭云山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8
重温历史 发展友谊——电影文学剧本《谭云山》创作谈.....	10
佛陀智慧：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祝贺洛阳白马寺印度佛殿落成.....	15
用心经营事业与爱情——记鲍思岱、朱新天访问深圳大学.....	18
加尔各答之行.....	19
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概览.....	22
中国人眼中的印度.....	29
观光祖国诗三篇.....	33

Newsletter of Indian Studies, Shenzhen University

2010.6.1

Contents

Newly-appointed India Ambassador to China Mr.S.Jaishankar visiting SZU.....	4
Newly-appointed India Consul General in Guangzhou Mr.Indra Mani Pandey visiting SZU	4
The 2009 China-South Asia Cultural Forum held in New Delhi.....	5
The 2010 China-India Forum held in Beijing	6
Commentary of Biopic Film Script ' <i>Tan Yun-shan</i> '	8
On the Creation of Biopic Film Script ' <i>Tan Yun-shan</i> '	10
Congratulations on the inauguration of India Buddha hall in The White Horse Temple	15
Postel, accompanied by his wife Zhu Xintian visiting SZU visiting SZU.....	18
A Trip to Kolkata.....	19
Dimensions of Chinese Studies in India	22
India through Chinese eyes	29
Three Poems on Sightseeing in homelad	33

印度新任驻华大使苏杰生博士一行访问我校

10月28日下午，印度新任驻华大使苏杰生博士（S.Jaishankar）一行莅临我校参观访问。我校校长章必功、副校长阮双琛在办公楼205会议室会见客人。

章必功首先对苏杰生一行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就印度大使馆对“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及“谭云山中印友谊馆”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当今印度社会发展迅速，是世界著名的人才输出大国，发达国家的各行业领域经常能会见到优秀的印度人的身影；印度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因此双方开展交流活动是非常必要的。在印度大使馆的帮助和支持下，我校已经成立了“印度研究中心”和“谭云山中印友谊馆”；上一任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女士也于2008年访问我校并发表演讲，还就文化交流、学术合作等问题与我们交换意见，相信今后的中印文化交流活动会搞得更好，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能与印度的大学展开合作。他还欢迎大使能常来我校访问，与我校师生进行交流。

苏杰生谈到，来中国就任已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这是第一次访问华南地区，感受颇深。作为一名新任大使，他对中国近年来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感到惊叹与振奋。由于与中国有着相类似的发展经历，因此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亲近感。印度某些专业领域已经步入世界的领先地位，这促使了印度社会的不断开放。现在海外的印度人才大量回流，表明印度充满了发展机遇，人才成为了印度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去年有近50万印度人民访问中国，有7000多留学生到中国求学，他相信这个数字还会不断的增加。他说，教育非常重要，能够塑造人的思想和精神。深圳大学是一所有活力的新兴大学，建立的印度研究中心和谭云山中印友谊馆一定能不断推进两国的文化交流。

会见结束后，宾主双方交换礼物并合影留念。苏杰生一行在校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校园、图书馆和谭云山中印友谊馆。

（深圳大学宣传部）

印度新任驻穗总领事潘迪先生一行访问我校

5月14日下午，印度驻广州领事馆新任总领事I.M.潘迪先生（Indra Mani Pandey）和副总领事一行莅临我校参观访问。校长章必功教授、外事处高立天处长和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会见了总领事一行。

章校长首先对总领事的到访表示欢迎，并感谢印度驻穗领事馆对深大印度学研究的关注和支持。章校长简单回顾了我校的印度学发展历程。他强调，印度学研究是我校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我校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印度学研究，并为之提供种种条件，力争把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建设成南中国最好的印度学研究基地，占据学术至高点。他希望在印度领事馆的支

持下，我校能与印度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多方合作和交流，进一步促进中印文化交流。

总领事 I.M.潘迪先生充分肯定了我校在开展在印度学研究上已取得的成果。他说，大学在中印两国的文化交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华南地区，深圳大学在促进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承诺将一如既往支持深圳大学的印度学研究，加强合作，开展多层面的文化交流，尽最大努力促成深圳大学与印度高等教育机构合作。他希望越来越多的深大师生对印度文化感兴趣，积极了解印度文化，增强两国之间的理解。他说，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主席，印度知名社会活动家，凯伦·辛格博士将赠送我校一批书籍，并计划今年 10 月访问我校。章校长对凯伦·辛格博士的即将来访表示欢迎。章校长说，2011 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在深圳举行，深圳大学将借此契机召开国际学术年会，他热忱邀请印度学者前来参加 2011 年学术盛会。总领事表示非常期待 2011 年学术盛会的召开，他将知会相关学者和大学校长，鼓动印度知名教授前来与会。

会谈结束后，宾主双方交换礼物并合影留念。总领事 I.M.潘迪一行在印度研究中心师生的陪同下参观了谭云山中印友谊馆。谭云山中印友谊馆是深圳大学学习印度文化的大教室，每到此参观学习的深大学子都会被浓厚的印度文化气息所感染。总领事 I.M.潘迪对谭云山中印友谊馆的建设给予高度肯定，他相信深圳大学的印度研究中心和谭云山中印友谊馆将为中印文化交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

第二届“中国-南亚文化论坛”在印度新德里成功举行

北外亚非学院南亚中心 佟加蒙

2009 年 12 月 4 日，第二届“中国—南亚国际文化论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井顿泉先生、印度司法部长 Shri. Veerappa Moily 先生、中国驻印度大使张炎先生等贵宾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讲话。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四川大学和上海社科院等七家单位的中国参会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也组织各省市代表团一行 100 多人参加了论坛。

本次论坛由印度德里大学、印度中国研究所、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深圳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论坛的主题为：“从地缘文明的视角看当代世界中的中国和南亚”。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为主办单位之一，派出了由亚非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教师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本次论坛。亚非学院张西平教授代表中方参会单位和学者致开幕辞，并且在会议中做题为“全球化初期的亚洲”的学术报告。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老师做题为“在新世界秩序中构建中印关系”学术报告。亚非学院南亚中心佟加蒙老师做了题为“郑和在南

亚：目的、影响与文化重要性”的报告。

北外亚非学院院长张西平教授在致开幕辞时指出，“中印学术机构共同主办论坛，可以代表两国的学术界向世界发出一个声音，即我们致力于通过学术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和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发展。2008年论坛的成功举行以及2009年论坛的胜利召开，都表明我们的理想正在得到践行，我们的合作一定能够取得长期的影响，其意义一定会超越学术和文化交流范畴，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发展也做出贡献。谭中教授倡导“地缘文明范式”，这也成为本届论坛的主旨之一，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及南亚地区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也将超越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在文明和文化相生共长的氛围中实现合作伙伴式的共存和生长。”

参加本次论坛的学者代表共有40余人，分别来自中国、印度、新加坡、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印度研究的重要学者谭中教授。谭中教授高度赞赏“中国—南亚国际文化论坛”在推动中国和南亚地区国家之间友好往来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并就第三届论坛的组织设想提出宝贵意见。在三天会议期间，各国学者就共同关心中印关系和地缘文明等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会议结束后，联合主办本论坛的多家单位达成一致意见，即要把这样一个高水平、辐射范围广的论坛继续举办下去，形成在中国和南亚国家轮流主办，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固定机制。

经过各主办单位的协商，第三届论坛拟于2010年下半年在中国云南和四川两地择机举行。参加了新德里论坛的云南和四川两地代表对主办论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也表明“中国南亚国际文化论坛”经过两年时间的发展建设，已经在机制、水平和影响力方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地方政府和学术机构都希望利用好论坛的平台，为推进本地区相关院所和部门的学术发展找到更多的机遇。而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为论坛的发起单位和联合主办方，将在新一届论坛的组织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记第二届“中国—印度论坛”

郁龙余

2010年5月15—16日，第二届“中国—印度论坛”在北京召开。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礼堂里，来自中国、印度、美国等国的二百多位与会者，纵论中印政治、文化、经济、环保等问题，取得积极成果。这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印友好协会主办，印度驻华大使馆等协办。中印友协会长蒋正华和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S.Jaishankar）在开幕式上先后讲话。中外80家媒体对这次论坛，给予了报导。

我应邀出席论坛，并于15日发表了题为《谭云山平凡而伟大的一生》的演讲。从未见过的画面，从未听过的故事，给所有与会者带来极大的视觉、听觉和心灵的冲击。《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纷纷采访，并表示要跟踪报导。事先，我提交的论文《电影文学剧本〈谭云山〉创作谈》，刊于会议论文集《从天安门到印度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印问题研究（*From Tian'anmen to India Gate: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ndian Issues Oriented to 21st Century*）》亦引起与会者及媒体的强烈关注。

在 16 日的环保议题讨论时段，我就印度环保部长近日遭遇诋毁一事发表意见：兰密施部长是一位知华派。他对中国的友好，建立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现状的认知的的基础之上。深圳大学于 2006 年翻译出版了他的《理解 CHINDIA：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思考》一书。我们认为，他首先是印度共和国的忠臣。在他任商务部长期间，大力发展中印贸易，担任环保部长后，中印联合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应有权益，都取得了中印共赢的预期效果。希望有着“坚持真理”传统的印度，能够尽快结束对兰密施的不公正的政治压力。我们不希望在中国封建社会出现过的“忠臣遭谗”的情况，出现在当代印度。我的以上发言，在中印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中获得共鸣。

通过参加此次论坛，我体会到中印两国政府和人民，愈来愈互相了解；真理与真相，愈辩愈明；中印友好、合作的基本面，远远大于矛盾与摩擦。而论坛是解决矛盾与摩擦以及互信不足的有效方法之一。

论坛简介

2010 年是中国、印度建交 60 周年。此前的 20 世纪 40 年代末，两国历经各自的长期斗争，相继获得民族独立与解放。相似的历史背景，使两国走到了一起，印度成为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三个战场，中缅印战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印度恰尔肯德邦境内，至今仍有占地约 600 平方米的中国军队公墓。

在长期的交往中，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印度，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同时也相互竞争。最近一些年，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新引擎，中国与印度间的“龙象”之争，更是举世瞩目。但是，在两国交往中，也存在着一些误解、误读、误区，从而产生了不必要的矛盾，影响了中印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影响了中印两国学界对彼此的认识和客观研究，进而影响了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这就特别需要中印学界的深层次交流。

为此，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印度友好协会在 2009 年 5 月 30 日—31 日，于北京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印度论坛。在此基础上，以庆祝中印建交 60 周年为契机，将于 2010 年 5 月 15 日至 16 日，在北京举办“第二届中国—印度论坛”，邀请印度学者、外交官与中国学者和外交官及各高校、研究机构的印度问题学者、企业家，以及中外 80 家权威媒体记者等 200 人一起，本着学术自由交流、媒体客观报道的立场，使中印两国学界与公众共同分析彼此间的“失”，分享彼此间的“得”，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友谊与共识，以更好地发展中印两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本届中印论坛的形式是：开幕式、主题讲演、学者评论、媒体问答

等。论坛结束后，与会嘉宾将到北京龙泉寺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大和尚谈禅，并共进素宴。

本届中印论坛高端学术交流会的成果，将通过 80 家中外权威媒体公开报道、论文结集《从天安门到印度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印问题研究》出版发行，充分体现。论文集编辑委员会主任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印度友好协会会长蒋正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共同担任，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论文集充分体现当代中国学界研究印度的最高学术水准，展示当代中国学界研究印度的整体实力，反映当代中国学界研究印度的主流思想，展望当代中国学界研究印度的方向与前景。

（摘自《第二届中国—印度论坛会议手册》）

传记电影文学剧本《谭云山》解说词

【编者按】传记电影是一面镜子，人们可以通过它看到一个人和折射出来的一个时代。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谭云山这个“功比玄奘，德配鉴真”的使者，和他为中印友谊穷毕生之力的年代，本期刊登郁龙余教授的传记电影文学剧本《谭云山》解说词和剧本创作谈，以飨读者。这是一部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剧本，剧中谭云山与中印两国政要之间的交往，特别是与泰戈尔的忘年之情，还有创建中印学会、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艰辛等等，无不令读者感动和钦佩。香港中文大学的黄维樑教授来函表达了自己对该剧的感受和期待，新加坡《新世纪文艺》（第五期）于 2010 年 8 月刊登全剧本内容。相信该剧本走上银幕指日可待。

谭云山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郁龙余

谭云山，中印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1898 年 10 月，生于中国湖南茶陵，1983 年 2 月圆寂于印度菩提迦耶中华大觉寺，享年 85 岁。他被誉为当代文忠，功比玄奘，德配鉴真。英迪拉·甘地总理，称他是“伟大的学者，崇高的文化人”。(1)¹(2)

1927 年 7 月，谭云山在狮城新加坡，见到心仪已久的伟大诗人泰戈尔。泰戈尔邀他加盟国际大学，他高兴地答应了。(3)(4)

1928 年 8 月，30 岁的谭云山告别妻子陈乃蔚和妻妹陈莱笙，乘轮船来到印度加尔各答，来到和平乡国际大学泰戈尔的身边。从此，谭云山的事业、家庭，和这块圣洁的土地和平乡，

¹ 编号为第二届“中国—印度论坛”上发表演讲时的图片编号。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5)(6)(7)(8)(9)

在泰戈尔的支持下，谭云山历尽千辛万苦，向中国名要贤达募款，于1937年建成中国学院。开幕典礼上，泰戈尔激动不已，称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甘地发来贺信，尼赫鲁派女儿宣读贺信，中国政要发来贺电。(10)(11)(12)(13)(14)(15)(16)(17)

魏风江，由中印学会理事长蔡元培派往国际大学的第一位中国学生。和泰戈尔、甘地、谭云山等结下深厚情谊，写有《我的老师泰戈尔》一书。1997年8月，拉·甘地总理邀请魏风江访问印度，庆祝印度独立五十周年。(18)(19)(20)

1956年11月25日，谭云山和魏风江在杭州西湖见面。师生久别重逢，忆及当年泰戈尔、甘地的教诲，以及临别所赠礼物（泥土、纺车、书籍、绘画、题赠等）感激不已。(21)(22)(23)

谭云山从1937年起一直是中国学院院长，直到1967年69岁退休。他用最少的钱建了最好的中国学院大楼。这是他为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制定的宗旨：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

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是这个宗旨依然富有生命活力。(24)(25)

这是谭云山为自己安身立命所写《中印箴铭》。是中印两大民族几千年文明的智慧结晶。比黄金、珍宝更加贵重。(26)

谭云山将教学看作生命，将学生看作最大财富。他说，在印度他既取经，也讲道。这是他在德里大学上课的场面，讲孟子的“三乐”。(27)

泰戈尔是谭云山的老师，又是朋友，尼赫鲁和谭云山有着深厚友谊。这是泰戈尔、尼赫鲁和谭云山的合影。(28)

这是尼赫鲁、谭云山和印中学会成员在开会。(29)

谭云山和其他人民领袖都有着深厚友情。这是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统普拉萨德和谭云山的合影，摄于就职典礼之后。(30)

向印度人民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立场，是谭云山在当时的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他发表演讲，写文章、出版书籍，为抗战服务。他为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起中国名：爱德华、巴苏华、木克华、卓克华、和柯棣华。并为他们做了大量联络、保障工作。伟大朋友柯棣华，为了中国抗战，不但毁家纾难，而且牺牲在华北战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等，给予了他高度评价。(31)–(37)

抗战期间，大量中国文化人来到印度，进行交流，寻求友谊与支持。他们中有太虚、高剑父、张大千、戴季陶、陶行知、徐悲鸿等等。谭云山的中国学院成了他们最好的落脚地。(38)–(45)

1942年，世界反法西斯及中国抗战面临最大困难。蒋介石和罗斯福通话后，决定访问印度。当时，印度人民和英国殖民当局尖锐对立。谭云山利用自己中国学院院长的身份，巧妙而得体地安排蒋介石夫妇和尼赫鲁在中国学院会谈，在火车上会谈，安排蒋氏夫妇在甘地的“三等车厢”里会谈。取得很大成功。(46)(47)(48)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谭云山给故人毛泽东主席写信，希望不要一边倒，与印度友好，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历史证明，谭云山的这三点意见，是有远见的。1956年，周

周恩来总理邀请谭云山回国观光，参加国庆典礼，历时 80 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长沙一师老师徐特立等都会见了他和他的长女谭文。(49)(50)(51)(52)

谭氏父女还访问了北京大学。季羨林、金克木接待了他们。金克木、徐梵澄在印度时都和谭云山有师生之谊，季羨林、金克木、徐梵澄被称为“中国梵学三维”。(53)(54)

1957 年 1 月，周恩来、贺龙访问印度，非常成功。但是出现了“周恩来总理劫持谭云山女儿”的雷人新闻。(55)

周总理向中国学院赠款赠书，谭云山非常感念。(56)(57)

受冷战大环境影响，中印兄弟一度交恶。谭云山始终坚持中印友好。他告诉英·甘地总理，1970 年天安门上的“毛笑容”(Mao Smile)是友好的表示。(58)

退休之后，谭云山坚持他的中印友好事业，同时努力筹建菩提迦耶的世界佛学苑，直到 85 岁逝世。谭云山的一生，得到了中国人民、印度人民的高度评价：那烂陀大学和国际大学授予他最高荣誉学位，名为“智慧海洋”和“邦国贤哲”。1998 年，中印两国为他举行一百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并出版纪念文集《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2008 年 11 月，在深圳大学举行“谭云山中印友谊馆”开幕典礼，在北京召开“纪念谭云山师觉月诞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59)(60)(61)(62)(63)(64)

谭云山精神永放光芒！

重温历史 发展友谊

——电影文学剧本《谭云山》创作谈

郁龙余

《谭云山》描述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创院，院长谭云山真实而传奇的一生。现在写这篇《创作谈》，也许对剧本读者，以及影片拍摄者，特别是导演与演员，当然还应包括影片观众，理解此剧意义及剧情，会有所帮助。

(一) 创作冲动来自何处

我是一个教书人，在北京大学、深圳大学教了四十年书，写过几本学术著作，但从未写过剧本，更遑论电影剧本。那么，我写《谭云山》的创作冲动来自何处？简言之，来自谭云山这位特殊人物的自身，是谭云山让我振奋、冲动。

我知道谭云山，始于文革时期的一次特殊的机会。业师季羨林先生，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员。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的“注音本”读物，每次都会给他寄赠一册。季先生曾患有名叫“枯草热”的鼻炎，每年一到秋冬季节，不知哪种花粉，会使他清涕流淌不止。严重时，他的鼻子像水龙头滴漏一样，一边说话，一边得用纸巾擦。那一年冬天，我在外文楼季先生

办公室，帮他把办公桌里几抽屉干的鼻涕纸倒掉。他把书架上的十几本拼音文字注音本递给我，说：“你不要去管那些拼音，这些文章还都选得不错，有空可以读读。”这批书里，有《五河县》、《尤三姐》、《范进中举》等等。另外，还有两本并不属于“注音本”的读物，其中之一是谭云山的《观光祖国诗及其他》。大概是因为这两本书的开本与厚薄和“注音本”读物差不多，所以季先生将它们混放在一起，统统送给了我。我后来问季先生：这位谭云山是谁？他说：这个人很了不起。还说：见过他两次，谈了很长时间。《观光祖国诗及其他》是1959年由印度中印学会出版的，扉页上用粗而潇洒的蓝色钢笔字写着“季教授羨林先生 指教 谭云山 一九五九年十月廿二日”字样。于是，我通过这本诗集，对谭云山有了初步而基本的了解。

1993年，我和金鼎汉教授赴印度出席第10届《罗摩衍那》世界大会。金教授告诉我，1956年10月，谭云山访问北京大学，他作为教研室秘书，陪同季羨林、金克木先生会见谭云山先生。1998年，谭中先生编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创院院长谭云山教授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一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我写《梵典与华章》（2004年出版）中的《功比玄奘 忍仙圆成——谭云山与中国学院》一章，对谭云山的相关材料，进行了一次学术梳理，对他作出了比较深入而具体的评价。2006年，谭云山的哲嗣——长子谭中教授访问深大，代表谭氏家族将“谭云山文献”捐赠给深圳大学，支持深大建立“谭云山中印友谊馆”。我一面组织深大研究生，将这些文献电子化，一边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建成“友谊馆”。在章必功校长的大力支持下，此馆于2008年11月21日开馆。来自印度、美国、加拿大、英国的20多位嘉宾出席。在此之前，正在深大的著名泰戈尔翻译专家董友忱教授，将“谭云山文献”中孟加拉文的重要内容译成中文。这样我就有条件接触到谭云山更加丰富的文献资料。

2009年10月，我着手撰写《中国印度文学交流史》中的《谭云山父子与印度现代汉学》一章，又重温了一遍谭云山的材料。深感谭云山太奇特，太了不起，可惜知道他的人太少。突发奇想，应该拍一部电视连续剧，三十集。可惜我没有时间写这么长的剧本。在班车上发此感慨时，坐在一旁的蔡枫博士说：可以先拍一部电影。于是写电影文学剧本《谭云山》的冲动就萌发了。这一发就不可收，四五天时间初稿就完成。原因是，这么多年来，谭云山一直活在我心中。开始，是他的形象、穿着，逐步到他的语言、思想，甚至内心深处一些并不见诸于文字的东西，我都能了然于胸。以前，我和人开过这样的玩笑：小学生三支笔，中学生两支笔，大学生一支笔，研究生不带笔。见到谭云山的照片，左右两个口袋里各别着两支笔，就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以后再也不能拿笔的多少来瞎开玩笑。谭云山影响我、改变我的，又何止于此。

谭云山是一位特殊人物，在特殊年代建立了特殊功勋。他功比玄奘，德配鉴真。同时，他并非遥不可及。他曾是一位热血青年，追梦一族，他忠于职守，他教子有方。他为中印友好奔走、守望了半个多世纪，最后终老五天，化为印土。他是中印关系的金桥，中印友谊的化身。

史盲则生愚，温故而知新。谭云山的一生，可以告诉中印两国当代的学者、政治家、媒

体人、青年和普通百姓，很多很多。

(二)《谭云山》的戏剧类型

编写电影剧本，我是十足外行。在创作之前，我到深圳中心书城买了一本汪流先生的《电影编剧学》。读后颇有收获，可以帮我少走弯路，或少闹低级错误。书中有一张表，[法]乔治·普罗第的《三十六种戏剧模式》。我对号入座想了一下，《谭云山》较接近第20种模式——“为了主义而牺牲自己”型。这一类型一共有四个特征，其中前三个特征是：A、为了诺言而牺牲自己的生命，B、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牺牲自己的生命，C、为了义务而牺牲自己的幸福。但是，这种接近是相对的。谭云山为了兑现对泰戈尔的承诺，奔波五十多年，为了中印友好和文化交流，牺牲了自己及家人的幸福。这是有公论的。但是，也有不符合或者说有突破之处。比如，谭云山是终老印度，不是英年早逝，所以不能说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关于牺牲幸福，他对家人尤其是妻子，确实充满了愧疚，但对自己无怨无悔。他的一生，劳心又劳力，走过的不是“八千里路云和月”，而是“八十万里风和雨”。路途中充满艰险，但他毫不畏惧。例如，1930年冬，他陪民国特使谢国樑去拉萨。不幸谢特使途中病故，他毅然只身进藏，向十三世达赖喇嘛递交政府文件。除了人生道路险阻之外，日机的狂轰乱炸，将他在长沙北门的家炸毁，妻子带着四个年幼的儿女，颠沛流离，给他带来极大悲伤。但是，他一生中精神上的痛苦，是最为巨大的。1962年，中印兄弟失和，在边境打了一仗。从此，谭云山就沉浸在精神痛苦之中。1962年12月24日，作为名誉校长的尼赫鲁到国际大学例行作报告，失败之后的心情当然不好。但当他看见谭云山端坐在人群中，便说：“你们有中国学院，院长是位著名的中国学者。这很好，使你们经常记得你们在过去与现在，都不会与中国文化，与中国的伟大为敌。”谭云山听后，泪流满面。第二天，印度各大报纸纷纷刊登这一消息。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谭云山这样有身份的学者。中印交恶之后，他本可以一走了之，去欧美、港台、东南亚，回祖国大陆更是没有问题，他一直拿着中国护照，是中国政协的特别会员，在国共两党的最高层，都有极好人脉。但是，他留在了印度做忍仙。“忍仙”是释迦牟尼成佛前的一个称号，做忍仙是所有选择中，最艰难的。他为何作此选择？因为他要为自己的承诺继续努力，为自己的信仰继续奋斗。他的承诺，就是办好中国学院，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他的信仰，就是“中印人民似兄弟，和平亲善数千年”。但他只是一介书生，左右不了局势，最后只能“愿代众生无量苦，皈依释迦学忍仙”。

谭云山做忍仙，是一种修为、等待和守望，一旦有机会，他一定决然为中印友好出力。1970年5月的一天，印度总理英·甘地夫人咨询谭云山：5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个“毛微笑”是什么含义？他敏锐而准确地告诉说：是中国改善中印关系的善意。谭云山每天至少读三张报纸，几十年剪报不断，整整积满两间屋。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对中印民族友好的等待和守望，所以他的修为做得到“难行能行，难忍能忍”。

谭云山的忍仙生活，实际上是对中印友好的无声呼唤。近几十年来，中印关系的不断改善，难道和他的无声呼唤毫无关系！谭云山自己也以85岁高寿谢世。从这个意义上说，谭云山以自己的超人修为，实现并坚守了自己的承诺和信仰，但没有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谭云山的高人之处，他不是西方戏剧理论中的悲剧人物，剧里剧外都不是。现实生活中的谭云山

所以能突破悲剧人生，关键是他的精神修为。由于他的忍仙的精神与作风，即努力以佛的胸怀和意志行事，不但正式开启了印度高校的中文教育，加强了中印友谊，为中国抗战作出殊大贡献，而且他倡导、践行的中国教、中印箴铭、太极神功以及大量诗文、著作等等，实实在在地为现代中华精神宝库增添了极为珍贵的新财富。这样的一位谭云山，绝对不是悲剧人物，而是一位东方式的英雄，像唐代的玄奘和鉴真。他的前半生，可以说功勋卓著；他的后半生，可以说忍仙圆成。他的一生，功德圆满，令人高山仰止。

（三）中印诗学与《谭云山》

我是研究中印诗学的，写过一本《中国印度诗学比较》。也许是渔家爱鱼，我创作《谭云山》电影剧本时，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若干中印诗学元素。

印度古典诗学中，有一味论派。大史诗《罗摩衍那》认为，味有七种：艳情、怜悯、滑稽、暴戾、恐怖、英勇、厌恶。后来，味的种类逐渐增多。泰戈尔对味的种类，有着自己的观点。他特别提出了“历史味”，认为“历史味就是史诗的生命”。他认为，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主味，就是“历史味”。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谭云山》，当然不是史诗，而是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但是我认为，如果要讲味的话，历史味应该是它的主味，而不是别的。因为谭云山是一位现代历史人物，在中印现代关系史、中印现代文化交流史上，地位极为重要而特殊。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谭云山，中印现代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就得大大地改写。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即使在文学剧本中，我们也必抱着严肃、客观、公正的写作态度，而不容许在基本情节和主要内容上有编造、虚构、演义的情况。历史的真实性是《谭云山》这部电影剧本的生命。

这样，并不能说《谭云山》在艺术上就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了，这部作品只是历史书的一个章节而已。比如，我们较多地运用了中国和印度共有的“天人感应”的描写手法。中国人的“天人合一”和印度人的“梵我一如”很为相似，由这二者衍生出来的创作手法“天人感应”，自然就会不约而同了。在中国和印度，这本来是寻常手法，无甚稀罕之处，但到了西方人那里，就引起了极大惊奇。比如，中国的三流小说《好逑传》，描写房间里男欢女爱，用屋外盆缸里金鱼戏水来渲染衬托。这引起歌德的极大注意。又如，印度古代的大诗人迦梨陀娑的名剧《沙恭达罗》，流传千古。在印度有这么一首梵语诗歌：“韵文里最美的就是英雄喜剧，《沙恭达罗》在英雄喜剧里总得数第一，《沙恭达罗》的第四幕又在全剧里好得出奇，第四幕里还有四首诗真算得是鳌里夺真，天下无敌。”西方人对《沙恭达罗》更是推崇备至。席勒甚至这样写道：“在古代希腊，竟没有一部书能够在美好的女性温柔方面，或者在美妙的爱情方面，与《沙恭达罗》相比于万一。”而印度人和西方人津津乐道的第四章及其中的四首诗，所用的正是“天人感应”的创作手法。描述沙恭达罗离开净修林，赴京寻夫的场景，一草一木，鸣禽瑞兽，都对她那么含情脉脉，依依不舍。

这种“天人感应”的创作手法，既然大家都喜欢，我在《谭云山》创作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运用了起来。例如，当谭云山和甘地、泰戈尔进行几次著名的谈话时，屋外都有孔雀、白鹤起舞，中国学院大厦落成典礼，场外有鸡鸭的欢腾，牛羊的自得。魏风江作为中国学院第一名学生，因抗战而与他亲自种植的椰子树、芒果树洒泪告别，场景动人，也正是这种“天

人感应”手法带来的艺术效果。

《谭云山》的叙事手法，也是从印度诗史中借鉴而来的。印度的两大史诗，无论是《摩诃婆罗多》还是《罗摩衍那》，都是根据讲述者所讲故事，连串组合而成。这种叙事方式至今并未过时，对于那些头绪纷繁复杂事象，有着惊人的处理能力。只要用得好，就能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之效。轻重、缓急、浓淡，互文、呼应、含蓄、寓意，应乎讲述者一心。两大史诗的讲述者，都是史诗中的角色，《谭云山》的讲述者当然也是剧中角色。不同的是，两大史诗的各位讲述者，在史诗中虽然很重要，但并非主角，而谭云山则是剧中的主人翁。

请主人翁谭云山来讲述故事，是我们的不二选择。中国和印度都是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多彩的大国，谭云山学识高深，阅人无数，历史跨越新旧两个时代。中国有“一部廿四史从何说起”的感叹，印度有“一部《摩诃婆罗多》从何说起”的说法，现在不但是廿四史和《摩诃婆罗多》加在了一起，还有西方的文化，就更纷乱繁复了。只有用讲故事的叙事手法，方能纲举目张，取舍有度，开闭自如。

而这个讲故事的人，又非主人翁谭云山莫属。一方面，自己的故事自己最清楚；一方面，他晚年在中华大觉寺禅修并最后圆寂的事实，是讲述者的极理想身份。全部的剧情，由谭云山临终前的忍仙形象，在禅境中通过梳理自己一生经历的方式，来一一展开，徐徐道来。不但引人入胜，而且在神秘庄严的气氛中，极大地增强了感染力。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谭云山在儿女家中养老，最终病逝在医院之中，我再请他做讲述人，氛围及效果肯定大不如现在。所以，请谭云山讲故事，既是学习史诗叙事手法，又是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结果。

有人问，剧本中不是用了蒙太奇手法吗？我对电影没有研究，不敢贸然说是与否。我要说的是，如果剧本中确有蒙太奇手法的话，那也是我学习、研究印度史诗的产物。印度史诗的表现手法可以总结为一句话——连串故事插入式。因为印度史诗卷帙浩繁，往往一讲就是几个月。故事人必须讲述一个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所以形成了大故事中套中故事，中故事中套小故事。每个故事，都必须有头有尾。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和稳住听从。电影的演出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左右，在这段时间里讲一个故事，是容易乏味的，需要用各种手法来拉住观众，包括把故事切成许多情节碎片，让观众在故事拼接中，既获得剧情的享受，又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这大概就是西方人讲的蒙太奇了。这在印度史诗中不太奇，甚至说是家常便饭，区别是，在史诗中故事不能切得太碎。长达数月的听觉艺术和两小时的视觉艺术，对构件的要求是不同的。

谭云山，被称为架设“中印友谊金桥”的人。我们通过影片，来艺术地重温历史，目的是发展中印两国友谊，造福中印两国人民。

附：黄维樑教授给郁龙余教授寄来的剧本评论

龙余兄：

谢谢大函，剧本《谭云山》……我用怀素带草读法读了一遍，深感佩服。谭云山的一生，通过大作剧本，精彩地呈现了出来。虽然读的是文字，感觉的却是活生生的人物，一个又一

个；是具体的事件，一件又一件。用“忍仙”的回顾来叙述很好：让波澜不算壮阔的一生有了跌宕。五十五年用心用力于“中国学院”和中印文化交流、中印友谊的推进，谭云山虽然没有玄奘跋涉（徒步、骑马）赴印之苦，没有鑑真六次东渡之险，其坚毅精神、不拔态度，仍然深深值得我们敬佩。您一定搜集了大量史料，斟酌损益，剪裁镕铸，才成此佳构。剧情主线贯串，叙述、表彰谭氏一生，少枝蔓，具见功力。正事大事之外，加了一些小趣事小插曲，活泼了气氛。（粤语的“食没野”宜道地地作“食乜嘢”；“无明”改作“唔明”。）谭云山办了中国学院。目前则有孔子学院，孔子学院的师生最应读这本《谭云山》。如要拍成电影，则投资颇大，而选角最难。甘地、泰戈尔、尼赫鲁、……还有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简直要像《建国大业》那种演员阵容了。谢谢让我认识了谭云山这样的能者贤者。“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风），山高水长”……祝近安！

弟

黄维樑 上

2010年3月12日

佛陀智慧：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祝贺洛阳白马寺印度佛殿落成

郁龙余

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伟大民族之间，存在着两个牢不可破的联系。在地质方面，是天造地设的喜马拉雅山，将我们两大民族，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在精神方面，是东方文明的精华佛陀智慧，将我们两大民族，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喜马拉雅山告诉我们，中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必须做兄弟、朋友、邻居；佛陀智慧告诉我们，中印民族如何和谐相处，做好兄弟、好朋友、好邻居。今天，洛阳白马寺印度佛殿的落成开光，就是中印人民做好兄弟、好朋友、好邻居的生动例证。

一、世界文化交流的典范

中印文化交流，在古代是以佛教为主要载体来展开的。时间长达一千多年，汉译的佛经汗牛充栋，正在整理出版中的《中华大藏经》达4200余种，23000余卷。其中，最重要、最具原典意义的是历代译经大师们的译作。佛经翻译，是人类迄今为止历时最久、成果最丰的伟大的文化工程。由佛教东传启动的中印文化交流，充满艰辛和困难，同时又充满和平与友

谊，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典范。

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谈起中印文化交流，曾动情地说：“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艺文无不蒙赐，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著名学者梁启超认为，随佛教进入的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过五大影响：（一）国语实质之扩大，（二）语法及文体之变化，（三）文学情趣之发展，（四）歌舞剧的传入，（五）字母的仿造。实际上，佛教东渐，带来中国的除了佛教教义、佛教文学之外，还有其它一系列的关联性成果，例如歌舞、音韵、绘画、雕刻、建筑、哲学、因明、美学、医学、天文、历算等等。今人王昆吾、何剑平的《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钮卫星的《西望梵天》、何炳郁的《阿输吠陀研究》、姚南强的《因明学说史纲要》、马忠庚的《佛教与科学》等等，正是对这些关联性成果所做的最新的深入研究。

历史发展到当代，中国人民依然享受着中印文化交流的果实。例如，佛经翻译时创造了大量的新词汇，不少词汇至今还常常出现在我的口头或笔端，如“世界”、“知识”、“惟心”、“真谛”、“因果”，等等。在译经实践中，中印译经家还共同创造了若干构词法，如“持业释”、“依主释”、“有财释”、“相违释”、“带数释”。今天，我还常用“带数释”这个方法来构词。如“三八作风”、“三好学生”、“两个务必”，等等。带数释是由“五蕴”、“六度”、“三十七道品”等词汇总结出来的构词法，之后就内化为汉语固有的构词法，今天如果不讲，一般人不会知道这种中国人普遍使用的方法，原来和中印文化交流有关。翻开中印文化交流史，此类例子不胜枚举。鲁迅说印度“贻我大祥”，我们在文化各个方面“无不蒙赐”，说的是实情，并非夸张之辞。

二、中国印度的共有财富

中印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玄奘说：“佛兴西方，法流东国”。（《大唐西域记》）是讲佛教诞生在印度，在中国大行其道。有些人就认为，佛教在印度后来就完全销声匿迹了。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印度，佛陀（Buddha）是觉者、智者的意思。佛陀智慧（Buddhi），一般汉译成“菩提”，是智力、理智、聪慧的意思。“菩提”加一个后缀“玛那”（有……的）就变成 *Buddhimān*（聪明的，理智的），加一个后缀“支维”（以……为生的），就成了 *Buddhijīvī*（知识分子，有学识的人）。佛陀虽然是释迦牟尼的尊号，但这个尊号来自民间，一直活在印度人的心中。

由于历史的原因，佛教的寺庙在印度慢慢荒芜了，僧侣组织也难觅踪影。但是，佛陀智慧是印度全民族的智慧，它并没有消失，而是为印度教、耆那教等印度宗教吸纳和延续，为广大印度人民所接受和尊奉。印度现代三圣，圣雄甘地、圣哲奥罗颇多、诗圣泰戈尔，都是佛陀的信徒。佛陀智慧中的精华，如和平、平等、慈悲、正道、诚信、不害、大度、忍让、俭朴、精进等十个观念，都是印度民族的主流价值观，过去是这样，现在依然是这样。

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由印度佛教变成了中国佛教。但是，佛教最根本的观念没有变，如上述的十大观念，依然为中国佛教所尊崇。不仅如此，随着佛

教的中国化，和儒、道成三教圆融之势，最终成为中华国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独立无二的现象。

儒道佛三教圆融，是在长期磨合中形成的，建立在功能互补的基础之上。儒家修身，经世致用；道家怡情，陶然物我；佛教治心，抚慰灵魂。儒道佛成品字型稳定结构，鼎足而立，共同建造和谐的中华精神家园。

这样，佛陀智慧成了中印文化中的共有元素，中印两大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

三、沿着佛陀的道路前进

佛陀智慧，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但是我们知道，“和平”（Shanti）是佛陀智慧中最重要、最本质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中印等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在国际生活中，具有普遍的影响力。“五项原则”，在印度称为潘查希拉（Pancasila, Panchsheel），即佛教的“五戒”。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曾在议会上说：“潘查希拉”一词是佛陀用来维持佛教教规戒律的一个印度古代术语，印度尼西亚政府采用了这个术语，当他在印度尼西亚听到这个术语时，觉得这是个美好的术语，对当今世界有重大意义。（尚劝余：《尼赫鲁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其实，印度的耆那教，也有“潘查希拉”，五戒的内容与佛教大同小异。中国的道教也有“五戒”，内容和佛教异曲同工。

今天，我们为白马寺印度殿的佛像举行开光典礼，使我们想起了玄奘、达摩等许多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先贤。站在佛像面前，望着他慈爱的面容，他那些充满智慧和深义的话语，萦迴在我们的耳边。在他众多的话语中，“和平”的声音依然最为宏亮。

洛阳白马寺，是中国佛教第一寺，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现在，在它的东侧建成了一座印度佛殿。这座完全由印度设计、印度材料、印度技术建成的印度佛殿，充满着古代印度的艺术风格，古色古香，美轮美奂。大殿中端坐在莲台上的佛陀像，是那么端庄、吉祥。这座佛殿和佛像，是印度人民送给中国人民的最可宝贵的礼物，是中印文化交流史和中印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必将永远载入中印人民的友好史册。

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有两个伟大的里程碑，一是火的发明，一是对和平的确认。从此，人类沿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道路阔步走来。今天，我们缅怀释迦牟尼这位人类的伟大智者，就是感念他对和平的确认和弘扬。

在中国，几乎和佛陀同时，和平也获得了伟大先贤们的推崇和坚持。《易经》中强调“太和”思想，“太和”就是“和之至”（王夫之语），《论语》讲“和为贵”，《礼记》提出“大同”观念。这些思想，和我们现在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完全相通的，和佛陀的“和平”思想，也是完全相通的。

现在，我们隆重集会，为印度殿佛像开光，是当代中印文化生活中的盛举，其意义就是，坚持在先贤和平思想的照耀下，为中印友谊、世界和平，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用心经营事业与爱情

——记鲍思岱、朱新天访问深圳大学

郁龙余

2010年1月，国际知名学者鲍思岱（Postel）、朱新天夫妇访问深圳大学。他们在6日、7日晚，为深大师生做了两场题为《印度王后井探秘》和《印度人的婚礼》的学术讲座，深受欢迎。1月7日中午，副校长李永华、国际交流学院书记晁委伟，设宴招待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晚上在开讲前，李副校长代表正在出访的章必功校长，向鲍思岱先生授予深圳大学“名誉教授”证书，向朱新天女士授予“特约教授”证书。鲍、朱深圳之行，时间虽短，影响颇大，《深圳商报》等自1月7日起给予了多次大版面报导。

鲍思岱，今年84岁，是法国反法西斯老战士，参加戴高乐将军的抗德部队，被选为美国飞行员。他功勋卓著，荣获法国国家骑士勋章。1949年开始，他一边在印度办制药公司，一边研究印度文化。六十年来，他将公司所得，一部分捐赠给印度医疗事业，一部分在拍卖市场收购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艺术品。1970年，在印度孟买成立印度文化研究所。1999年，倾其所有，在法国BIARRITZ市成立“东方艺术博物馆”（ASIATICA），成为与大英博物馆、巴黎吉美博物馆齐名的欧洲三大博物馆。经过数十年的田野调查、实物考证，鲍思岱出版了十几种学术著作，成了享誉国际的南亚艺术史研究大家。

朱新天出身杭州书香门第，今年59岁，是一位著名画家、摄影家。1986年以杭州大学文博专业教师身份赴法国深造，获巴黎第八大学比较美术国家硕士学位和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远东艺术与考古学国家博士学位。她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及著作，在国际学术界获得高度评价。其中，博士论文《印度艺术中的神兽 VYALA》、《中国扬州画派与法国印象派的比较研究》，被学术界喻为印度艺术研究及中法艺术比较的扛鼎之作。2009年中文版《印度教万神殿艺术——印度王后井探秘》，一经问世，即被视作经典。中国著名学者、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柴剑虹评价说：“您又近二十年如一日，进行这项伟大的事业，我深为钦佩！初步翻阅您这部书，我感到王后井的万神殿艺术考古所展现出的历史文化瑰宝也将推动诸如敦煌学、中亚学这些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

朱新天与鲍思岱一起，共同创办和经营东方艺术博物馆和印度文化研究所，为东方艺术的研究、收藏、展览，作出了巨大贡献。她用近20年时间，研究、宣传印度的王后井，终于促使这默默无闻的地下艺术宝库，于2009年1月入列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09年11月，当我打开朱新天从印度孟买寄来的《印度教万神殿艺术》一书，顿觉眼前一亮。读了一遍，觉得回肠荡气，提笔给她回信，写了三点：您是印度艺术的恩人，您是朱家的荣光，您是我朋友中的骄傲。

2010年1月6日下午，我在深圳蛇口码头接到他们夫妇，说：我们是第三次握手。朱新天用法语翻译给鲍思岱听，他那张经典的法国脸莞尔而笑。

我和鲍思岱、朱新天第一次握手，是 1993 年夏天在维也纳召开的“欧洲华人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会议期间，组织者安排一次去维也纳森林用餐。这维也纳森林有点儿像京郊香山的农家乐。用餐时，朱新天将我邀到他们的桌上，边吃边谈印度文化。因为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所以印象深刻。

第二次握手是在上个世纪末的深圳。中国一家企业要引进鲍思岱医药公司的一种治糖尿病的药，约好在深圳商谈协议。我和内人郑亦麟一起去宾馆看望他们。之后，有了好一阵子的书信往来。但不知何时，就断了音讯。所以，当 2009 年 11 月突然接到她寄来的皇皇大作，实在喜出望外。对我来说，没有比见到友人传世大著出版更高兴的事了。

鲍思岱、朱新天的深圳之行是愉快而成功的。我从深大的许多学生反映中，得到了这种印象，也从深大教师的口中，得到了印证。其中，师院的刘艳红老师说得最真切。刘老师是深圳导游协会会长，英文好，见多识广，接待宾客是她的专长。所以，我劳她驾，请她参与做接待工作。等送走客人，刘老师对我说，很成功，很圆满。我问，怎么说？刘老师说：你看，他们在台上做报告时，极自然、默契，鲍思岱发言时，朱新天帮他打开矿泉水瓶盖；朱新天发言时，鲍思岱的手一直扶着话筒。

鲍思岱和朱新天，不仅给我们送来了精彩的讲座，而且告诉了我们一个根本而重要的道理：男人未必只顾事业，不要爱情；女人未必都是男人事业的毒药，无心事业。只要用一颗纯粹的心，去呵护、经营，男人和女人，事业和爱情，不但可以比翼齐飞，而且可以飞得更高、更远。

加尔各答之行

董友忱

应泰戈尔印度大学的邀请，我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乘坐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印度西孟加拉邦的首府加尔各答。飞机抵达那里时已经是北京时间 29 日凌晨 2 点半。泰戈尔印度大学派车到机场来接我；我的好朋友——加尔各答大学语言系主任奥尔琼·绍尔卡尔教授也赶到机场来欢迎我。这次加尔各答之行的主要目的，是接受泰戈尔印度大学授予我的荣誉文学博士称号。我知道，荣誉文学博士是一种崇高的荣誉，在印度西孟加拉邦只授予在文学等领域作出过杰出贡献的极少数孟加拉作家、诗人、文学家、艺术家。

到了加尔各答之后，我又接到西孟加拉邦政府所属的孟加拉文学学院的信函。信函说，为了表彰我在研究和翻译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著作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西孟加拉邦评选委员会决定授予我泰戈尔纪念奖，并请我出席 2010 年 5 月 9 日晚 5 点在孟加拉文学院举行的授奖仪式。这个消息，在出国之前我是不知道的。得知这个消息后，我自然很高兴。印度的朋友们也纷纷到我的住所或打电话来，向我表示祝贺。

5月4日我给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的毛四维总领事打电话，告诉他我来印度的情况。他说，他次日就回国休假，让我跟张副总领事联系。

5月7日上午，我前往总领事馆，会见了张铁建副总领事，向他汇报了这次来印度的主要目的：5月8日上午10点在泰戈尔故居焦拉萨科接受西孟加拉邦总督将颁发给我的荣誉文学博士证书；5月9日晚上5点在孟加拉文学院接受泰戈尔纪念浆。

5月8日是星期六。早晨7点多，我的一个孟加拉朋友就送来了一件胸前绣花的黄色印度长衫和一条白色裤子，并且希望我当天穿这套服装去接受文学博士证书。朋友的深情，我不好拒绝，只好穿着这套服装去参加上午的仪式。

9点多。泰戈尔印度大学的一位教授带车子来了，随后陪我和孟加拉国的女作家舍莉娜·侯赛因（她也将接受荣誉文学博士称号）前往泰戈尔故居焦拉萨科，参加泰戈尔印度大学第35届年会暨颁发荣誉文学博士证书的仪式。35分钟后我们的汽车到达那里。大门口有不少警察，在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在院子里搭起了一个很大的长方型彩棚，全部用白蓝两色布料装饰起来，还装有十几个吊扇和电灯。舞台设在南端，舞台的地上铺着地毯，后面墙上贴着大字会标、挂着大幅泰戈尔照片；舞台的周围摆着鲜花，前排的桌子上面蒙着白布，摆着小花篮。舞台下边摆放着椅子，大约有上千个座位。整个会场简直就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礼堂，看上去，很典雅，也很壮观。

我和舍莉娜·侯赛因被引进到楼内的贵宾休息厅，在指定位置做下来。两位女教师走过来向我们献上围巾，戴上胸花，点上吉祥痣。快到10点的时候，我们走出贵宾厅，迎接孟加拉邦总督M.K.纳拉扬的到来。不一会儿，总督的车队到来。前边有两辆警车开道，总督从第三辆车子上下来。副校长科鲁纳信图·达什，走上前向总督献了一束鲜花。接着，我们跟随总督走向舞台。总督和副校长在前排坐下来。将被授予荣誉文学博士称号的我们七位学者坐在舞台偏右的一排座位上，前面一排低矮的茶几儿上盖着白布，上面摆着写有我们名字的牌子。

M.K.纳拉扬总督站起来宣布，大会开始。大家起立，站在舞台下前面的20多名男女学生，在乐队伴奏下唱起了吠陀赞歌和校歌。接着副校长做报告，总督讲话。随后，总督向我们颁发荣誉文学博士证书和银盘。被授予文学博士称号共七个人，其顺序是：78岁的著名孟加拉诗人松科·高士教授；73岁的泰戈尔研究专家和翻译家董友忱教授；63岁的孟加拉国女作家舍莉娜·侯赛因；加尔各答大学语言系著名的梵语、巴利语和普拉克里迪语的学者——绍多龙琼·般多巴泰（班纳吉）教授（可能有80多岁）；96岁的著名印度学者——印度古典哲学专家迪依纳特·特里巴提；80岁的奥莫楞杜·戴教授；94岁的音乐家戈巴尔·丘多巴泰。

泰戈尔印度大学还印制72页厚的一本书《他们的光荣，是我们的骄傲》(Their Honour, Our Pride)，封面和封底印有我们七个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的学者的照片。书中分别介绍了七个学者的情况，并在介绍文字的前一页刊印每个人的大型照片。颁发文学博士证书之后，副校长向优秀学生们颁发奖章和证书，等等。将近12点仪式结束了。

我的一批印度朋友，例如，画家阿弥陀佛及其妻子雕塑家奥妮达、女儿因德罗葆蒂，电信报的高级编辑阿希湿，卡拉姆·阿扎德亚洲研究所所长瓦苏代瓦，前泰戈尔博物馆馆长马宗达，前西孟加拉邦文化部部长奥奴波·莫迪拉尔，华人朋友李万城、陈富兴等。都来参加

这个颁发证书的仪式。会议结束后，他们拥到我身边，向我表示祝贺。总之，我觉得我一直处于朋友们的友爱和关怀的气氛之中。

5月9日上午，西孟加拉邦政府文化局的领导陪我前往加尔各答北部的巴尼普尔镇，参加那里艺术培训中心举行的庆祝泰戈尔诞辰的活动。文化局的领导向与会者介绍了我研究和翻译泰戈尔的情况，我做了简短的发言，讲述了为什么我要做这项工作及今后的打算。我要在我的晚年尽力作好翻译《泰戈尔作品全集》的工作，让中国人民，特别上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泰戈尔。明年5月在泰戈尔诞辰150周年之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前5卷，以后陆续出版后13卷。同时出版我写的泰戈尔传——天竹诗人。会议组织者对这次活动进行了录相，当我告别时，向我赠送了我参加活动的录相光盘。

随后我们驱车前往附近的一个村庄，参加了那里的农田，我会见了正在打稻谷的农民们。一个年轻小伙子，飞速地爬上高大的椰子树，砍下了五六个椰子。主人砍开椰子，请我饮椰子汁，品尝椰子肉。我由衷地感谢他们，然后同他们告别。回到住所已是下午3点了。

4点多，孟加拉朋友陪我前往孟加拉文学院。4点40分我到了那里。会见了孟加拉文学院院长绍诺特库马尔和该院主席——著名诗人尼棱德罗纳特·丘克罗博尔迪等一批文化人。在孟加拉文学院的院子里，同样搭建起一个很大的彩棚。

5点整，大会开始。首先欢迎获奖者和主宾入场。接着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布罗碧·穆科巴泰演唱两首歌曲。大会由该院副院长尼洛伊·高士主持。尼棱德罗纳特·丘克罗博尔迪宣布获奖者名单。接着，绍诺特库马尔院长致欢迎词。随后颁发铜版证书：首先尼棱德罗纳特主席向82岁的诗人莫宁德罗·古普多颁发证书，接着由著名小说家苏尼尔·贡戈巴泰向我及其他两位学者颁发证书。

然后获奖者讲话：第一个发言的是莫宁德罗·古普多，他读了一篇比较长的讲稿。我是第二发言。我说：“今天出席这个仪式，我非常高兴。我首先要感谢西孟加拉邦评选委员会和孟加拉文学院授予我泰戈尔纪念奖。我认为，这个奖励不是仅仅授予我一个人的，而是授予从事泰戈尔研究和翻译的所有我的中国同事们的。我在自己的晚年将竭尽全力努力作好《泰戈尔作品全集》的翻译工作，让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伟大诗人泰戈尔。我相信，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之间的友谊一定会更加巩固！”我的讲话赢得了四次热烈的掌声，可能是因为我是外国人居然能讲孟加拉语，大家感到新奇，其次是我没有读讲稿，而是即兴发言。最后，主宾苏尼尔·贡戈巴泰讲话，他特别提到我所做的工作。

颁奖仪式结束后，我熟悉的孟加拉朋友们都很高兴。阿希湿和其他朋友们决定请我去华人街区的餐馆吃中餐，来庆祝我今天荣获泰戈尔奖。

印度的报刊对我来印度接受文学博士称号和泰戈尔奖进行了报道。我所看到的报道有：5月10日印度孟加拉语最有影响的报纸《欢乐市场报》(anandabazar patrika)就刊登了我的照片和关于我的情况报道。5月10日和11日《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连续两天也刊登了我从苏尼尔手中接受证书的照片。5月9日《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刊登了我和孟加拉总督的照片。住加尔各答的李嘉祥、李万城、钟彪兴、吴继宏、陈富兴等11位华人朋友在5月9日的《印度商报》头版发表了祝贺词：“热烈祝贺董友忱教授荣获泰戈尔大学荣誉文学博

士暨西孟加拉省文学院 2010 年度泰戈尔纪念奖。促进辉煌中印文化交流，加强两大文明古国友谊。”

这次印度之行，使我深切地感受到印度孟加拉人民对中国人民所怀有的深厚友情。23 天来，我始终生活在友谊之中。从接待我的老师、客舍服务员、做饭的厨师，我所接触到的周围的朋友们，都真诚地帮助了我。卡拉姆·阿扎德亚洲研究所的所长瓦苏代瓦带车来我的住所，把我接到他们的研究所，带我参观他们在盐湖区新建的研究所，随后带我去一家高档的印度餐馆，请我吃印度餐。随后又陪我去国际大学设在加尔各答的出版社购买《泰戈尔书信集》。沈纳兰、阿弥陀佛、阿尔琼、迪邦科尔、那济世、久伊达等孟加拉朋友，都先后请我去他们家里做客。拉焦斯丽陪我参观罗摩黑天教会所在地各个神庙，然后他们一家请我吃饭。即便是偶尔遇到的陌生的孟加拉人，他们也都热情地帮助我。

有一次，我从亚洲学会乘坐地铁到沙姆市场。出了地铁，还要乘坐公共汽车才能到达泰戈尔印度大学。当我向一位与我一起出地铁的陌生男子询问时，他热情地把我带到汽车站，把我送上汽车，并且告诉售票员我在什么地方下车。汽车开动了，他才回家。我希望，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树永远长青！

2010 年 5 月 23 日

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概览

[印度]哈拉普拉萨德·雷易 (Haraprasad Ray) 著 蔡晶¹ 译

筌路蓝缕

1918 年，加尔各答大学为印度历史文化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了一门“中国语言文学”课程，为将东亚研究提升到学术高度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当时的副校长阿胡托什·穆克吉 (Ashutosh Mukherji) 先生意识到了这门课程的重要性，然而遗憾的是印度并没有能胜任的中文教师。因此，该大学委派一位曾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巴克齐 (Prabodhi Chandra Bagachi, 即师觉月) 去往河内、日本和法国，以使他更加完善其专业。师觉月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四卷本的印度中国丛书中。前两卷有将近 800 页的篇幅，细致地纵览了印度佛教典籍的中文译介。后两卷则对中国古代两大中梵辞典进行了批评研究。这两大辞典编纂于唐朝时期，供佛教学者使用。师觉月的著作为印度学家的研究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然而，其著作仅被译为英语。

1921 年，伟大的诗人和教育家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创立了国际

¹ 译者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博士生候选人。

大学 (Visva-Bharati University), 在组织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该机构被建成东方人文大学, 而中国学研究则在课程设置中占据突出的地位。访问教授西尔万·列维(Sylvain Levi)首开中国佛学研究的课程。1924年泰戈尔访华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学的研究。1937年, 在谭云山教授和泰戈尔的其他中国朋友的帮助下, “中国学院”(Cheena Bhavana) 在国际大学落成。这是一个相对完备的中国学研究学院, 由谭云山主持。通过各种资源在中国搜集到的图书, 使一个比较大的中文图书馆得以建立。

抗日战争时期,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Pandit Jawaharlal Nehru)于1939年访华, 1942年, 中国国家首脑¹访印; 此次互访促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抗战期间中国不少大学迁往重庆, 为大量中国学者出访印度创造了机会。他们在印度的出现激发了一些印度学者对中国学研究的兴趣。就在那时, 浦那弗古森学院(Fergusson College)成立了一个小的中国研究中心。P·V·巴帕特(P.V. Bapat)博士和V·V·戈卡勒(V.V.Gokhale)博士开始了对巴利文、梵文和汉文佛教典籍的比较研究。

1944年, 重庆印度政府的总理事K·P·S梅农(K.P.S.Menon)首次为大量印度学生赴中国学习创造了机会, 在双方政府交换项目安排之下, 一些印度学者来到重庆, 同时, 数量相当的中国学者前往印度的大学学习。日本投降后, 梅农回到中国, 担任独立后印度的第一任大使, 为印度学生赴中国进行专门学习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印度政府将八名印度学生送往北京自费学习, 北京大学为他们提供了全面的学习条件。其中三名艺术专业的学生师从中国著名的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先生学习绘画。1948年, 在派送第二批学生去往中国之前不久, 印度政府向北京大学派驻印度历史文化讲座教授两年, 并委任师觉月协助北京大学建立梵语和印度学研究系。师觉月在京两年期间, 也为不少印度学生在北京工作创造了新的条件。1950年, 国际大学的中印研究重新整合, 与印度研究合并, 纳入一个研究中心, 由师觉月教授主持; 中文教学仍由谭云山主持。²

印度文化国际学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也推动了中国学研究的发展。该学院由著名学者拉古维拉(Raghuvira)博士创立并担任第一任院长。罗怙毗罗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洛克什·钱德拉(Lokeshchandra)博士, 前国会议员继任院长职位。这一机构旨在出版所有在东方发现的印度文学脚本, 既有藏语, 汉语, 蒙古语, 日语或其它语言的原本, 也有译本。许多外国学者应邀在此机构工作。

1954年, 中印双方签订通商和交通协定³, 中印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继之中印学者的往来开始正常化。尽管或有中断, 总体趋势是持续的。这种往来进一步推动和鼓励了印度的中国学研究进程, 研究领域涉及语言、文学、历史、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等。

中国佛教和中印文化研究

在印度国际研究院 (Indi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即现在的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

¹ 此指1942年蒋介石访印。——译者注。

² 见师觉月编, 李华德(W.Liebenthal)校: “印度的远东研究”载《远东季刊》第8期(1953-1954), 第112-114页。

³ 《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译者注。

院)建立之前,学者们所从事的中国学研究,基本上集中在中印佛教研究方面。除了我们已经熟知的师觉月的研究成果之外,其他一些具有梵语和巴利语基础的学者所做出的贡献也不容忽略。比如巴宙(fa chow)的《四分律(Dharmaguptaka-vinaya)第一波罗夷法(parajika)与巴利律经分别部(Suttavibhanga)》;师觉月的“《<百缘经>(Avadanasataka)及其中译本校注》;萨蒂兰詹·森(Satiranjana Sen)的《两部汉译医学著作》。师觉月的《帕坦(Pathan)时期中国和孟加拉之间的政治关系》,巴帕特的《佛说义足经(arthapada-sutra)》,载《国际大学学报》第一卷,同刊第六卷还发表了沙斯特里(N.Aiyaswami Sastri)的《龙树(Nagarjuna)之<十二门论>(Dvadasamukha Sastra)》。在国际大学的赞助之下,大量的研究也在筹备。包括V·拉马南(Ramanan)博士在汉文资料¹的基础上所作的《龙树的哲学研究》(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云华的(Y.H.Jan, Ran Yunhua)的《中国佛教编年史》(国际大学)和《中国佛教的变迁》(以宋代的研究著作《佛祖同参集》为基础,未出版论著,国际大学)。师觉月所译的慧立²撰《释迦方志》,在其去世后,也由国际大学出版。国际大学的另外一位学者,B·D·穆克吉(B.D.Mukherji)研究了“德国佛教律宗(Vinaya School)中的说一切有部(Sarvastivada)”。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N.C.赛恩(N.C.Sen)的《唐代正史中的印度和克什米尔》值得一提;H·P·雷易(H.P.Ray)则在汉文资料的基础上研究了15世纪的印度;谭中的课题“印度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也比较重要,是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ICSSR)课题。(未出版)

这里必须要强调国际大学的谭云山教授的非凡贡献,他放弃了在中国待遇优厚的职位,与伟大的诗人泰戈尔共同致力于加强喜马拉雅山双子——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联系。经过不懈的努力,他创建了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中国研究院”,描述佛陀生平的壁画以及从中国的不同地区搜集而来的有关佛教、历史和其他经典的千余珍贵作品将整个建筑装饰得十分宏伟华丽。他的贡献将被所有热衷于中国学研究的学者铭记景仰。

在谭云山的鼓励下,很多学者开始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研究。其中,国际大学奥利雅语(Oriya)与梵语系的布拉赫拉·布拉坦(Prahla Pradhan)教授,对古汉语十分精通,并利用中文材料进行佛教研究及印度文字起源的研究。后来,该大学的布拉帕特·穆克吉(Prabhat K Mukherjee)教授,也即泰戈尔的传记记者,随赛勒维恩·列维学习中文,并著有《印度文学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传播》,目前该书印刷本已经失传。

有关现代中国的研究领域

随着50年代印度国际研究院东亚研究系的建立,一个新的研究纬度更充实了中印研究。此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涉及到诸多主题,其中包括:中国的外交政策;经济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对印度革命的影响;欧洲人对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曲解及对“华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误解的颠覆;对中国社会-政治改革家康有为与印度宗教-社会改革家;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即辨喜)的比较研究;对1949年后第一个二十年知识分

¹ 应指仅存的汉译《大智度论》。——译者注。

² 应为道宣。——译者注。

子的研究；对中印外交政策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国的科学政策、安全与防御及工人在管理上的参与等等方面。

印度学者在对中国文学的批评研究方面的兴趣似乎并不显著。一些文学研究者虽然从英译本翻译了一些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但是对中国文学的批评研究是从 A.N.泰戈尔 (A.N.Tagore)对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学的不同流派的研究¹开始的。然而，在尼赫鲁大学举办鲁迅百周年纪念庆典时，认真的尝试是显而易见的。来自印度各邦的学者、文学家，来自中国的一些学者，包括一些学习中国语言的学生递交了三十余篇研究论文，内容不仅涉及到鲁迅作品的各个方面，也论及了鲁迅的现代影响。H.P.雷易博士对鲁迅与萨拉特·钱达·查特吉 (Sarat Chandra Chatterjee) 的比较研究在尼赫鲁大学语言学院学刊 (*Journal of the School of Languages, JNU*) 上发表²。

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研究成果述评

无论是尼赫鲁大学的东亚研究系 (在 SI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国际关系学院) 以及开设的中国语言课程 (在 SLL&CS, School of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语言文学和文化研究院), 还是德里大学的中国与日本研究系, 其存在历史之久都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由于目前所有的这些研究活动都集中在德里,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现存的资料, 尝试对中国学研究状况进行一个概观。

德里大学中国与日本研究系至 1987 年已经产出 6 篇博士论文。³其中, 一篇关于中国与世界, 4 篇涉及到国内政治发展, 另一篇则着眼于中国的科学政策, 也是印度的整个当代中国研究历史中唯一一篇此类论文。但是副博士论文 (M.Phil)⁴却表现出较为多样化的特征。在 28 篇论文当中, 有 5 篇聚焦于中国与世界, 其余 23 篇均涉及到国内发展, 其中论及经济问题的有 4 篇, 以中国教育为主题的有两篇, 关于农业的有 3 篇, 还有一篇着眼于妇女研究。

关于德里大学的资料, 谭中的博士论文不包括其中。 (《清政府对鸦片贸易的立场》, 成文于德里大学历史系)。德里大学有一些教师在国外修完博士学位, 如 K.P.顾卜塔 (K.P.Gupta) (康有为与辨喜研究), 莫汉蒂 (Manoranjan Mohanty) (中国革命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 以及斯里玛蒂·查克拉博蒂 (Srimati Chakraborty) (中国与纳萨尔派⁵) 等。

在尼赫鲁大学, 我们搜集到自 1961 年 (或许第一篇是在以前的 ISIS, Institute of science in society, 社会科学院) 至 1992 年副博士与博士论文的资料。

在 18 篇博士论文中, 6 篇涉及到中国国内的政策, 包括 1 篇探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用的论文和一篇论及“四人帮”的论文。另外有几篇立足于编年史研究, 还有 1 篇是关于西藏

¹ 并出版《现代中国文学论战: 1918-1937》一书。

² 第一卷, 1990 年。第 164-182 页。

³ 这些数据见马诺哈尔 (Manohar Lal) 的《中国报告》, 第二十四卷, 第 4 期, 第 481-485 页。

⁴ M.Phil, 研究式硕士, 即 Master of Philosophy, 一般学制为两年。亦被常视为修读博士课程的一部分。校方对于申请博士课程的学生常会先接受其为 MPhil 学生, 若其研究绩效良好, 则同意该名修读博士学位。因此, 译者将其译为副博士。——译者注。

⁵ Naxalite, 印度主张通过农民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译者注。

的宗教和政治；其他的均涉及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

到 70 年代后期，副博士学位引入印度。第 1 篇副博士论文完成于 1972 年。至 1992 年共有 70 篇论文通过了审核。其中有 26 篇论述国内发展，4 篇论及社会主义，其余则全部涉及中国与世界。

在以中国的发展为主题的论文中，2 篇谈到西藏问题，3 篇论及台湾问题，1 篇着眼新疆问题，只有 1 篇涉及到 1949 年以前的时期（1928—1937）。4 篇论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他防御事务，4 篇有关于中国经济，并且每一篇都提及农民和教育。2 篇以防御为主题，10 篇以后毛泽东时代的发展为主题，除此之外，有四位学者着眼于中印关系（1951—1955，1969—1979，还有 1 篇牵涉到达赖喇嘛的因素），一位学者关注中印边界问题，七位学者分别关注中国与其他邻国，如孟加拉、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柬埔寨（1970—1975）、日本及越南的关系。其余学者则着眼于宏观国际关系方面，如中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中国与不结盟运动、中国与西方国家等等，还有 1 篇论文涉及到印度的西藏政策。

评价

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趋势。在博士预科阶段，学者们关注了这一领域的不同方面，并且有一个多样化研究趋势正在萌芽。但是当他们涉足某些领域时，需要更加深入地挖掘比较复杂晦涩的中文资料，于是他们的兴趣开始集中于某些特定主题。这些主题或许在新闻业界被广泛地探讨，或者具有一定的时事价值，因此往往会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这种趋势的出现或许与缺乏原始资料有关。在利用中文原文第一手资料或者即便是在中国发现的第二手资料方面，从预科博士阶段开始直至博士阶段越来越贫乏。在印度诸大学的论文中，鲜少有搜集了原始资料的痕迹。尼赫鲁大学学习中文的学生在结束 5 年硕士课程之后才可以开始博士课程，他们完全有可能成为中文语言学家，并会在未来几年里展示出他们在这方面的优势。德里大学也开设了中文强化课程。这两所大学的学生有机会到中国进一步深造。如果他们不去从原始资源中利用一手的信息，那就前功尽弃了。

这两所大学应该从事大量的研究工作，然而在目前的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缺乏当下最急需的指导和合作等等。举例来说，中印关系，其悠久的历史，近十年的经历，两国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等这些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学术上的充分重视。过于强调政治方面，包括国际关系，只能导致理解上的失之偏颇。我们还应当充实这些研究，必要的时候，将触角探入社会学、经济、历史的层面，综合这些角度来全面的认识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然而这些方面却完全被忽视了。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中文素材极少被用于研究中，而且，确保学生扎根语言和历史的任务也没有给予充分强调。

在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的分类研究项目中，有一个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充分尝试对中印边界争端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加尔各答大学的卡鲁纳卡尔·古普塔（Karunakar Gupta）博士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唯一学者。¹事实上，一些外国评论家和记者已经就中印边界问题发表

¹ 卡鲁纳卡尔·古普塔博士于 1974 年出版了《被隐藏的边界》，着重研究 1947 年印度独立后的中印边界问题。——译者注。

了不少文章。当我们发现一些博士级别的高级学者对中国对其他地区的外部政策表现出过多的兴趣，而忽略了与我们最直接相关的问题时，会尤其感到不安。

对于 1949 年之后建立的中国与日本研究系，我们认为不应当仅仅归因于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出现。这种片面的观点已经导致了某些研究过剩，不管重复非印度学者的研究，还是保存二手资料，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落后于中国迅速变化的时局。而强调研究的意义有助于双方在一个较好的基础上互相理解发展实践、教育和其他领域的经验。人们将更倾向于关注更加基本的和实质性的主题。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表现出对汉学研究的兴趣。他们从事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并且将其学者送往中国大陆或台湾，进行语言强化培训，以便于深入钻研中国学研究的不同精彩方面。我也曾经见识到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转圜于鹿肉、鹿皮、龟壳、货贝、燕窝及肉桂贸易，锌贸易和明清时期海上贸易所包含的其他商品之间。¹

一些新的维度

近期的研究为进一步研究中印关系史带来了极大的可能性。

1、我们可以根据中文、藏文和其他一些资源重构印度整个古代时期和中世纪时期的历史。通过参考中文资料，我们可以确定一些古老名词如印度(Hindu)、梵(Brahma)、恒河(Ganga)的起源；并且为《往世书》(*Purnans*)和《本生经》(*Jatakas*)中地理政治方面的记载提供佐证。

2、在南印度朱罗(Cholas)帝国势力的兴起的时候，中印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大约从 1015 年起，王朝的历史学家和中国官员及旅行者的个人著述中，就有关于此的详细记载。比如，朱彧撰《萍洲可谈》(1119 年)；周去非撰《岭外代答》(1178)；赵汝括撰《诸蕃志》(对域外人士的记载，1225)；汪大渊整理了其于 1330—1349 年间亲历海外时的笔记，并在 1405—1433 年间随郑和下西洋的译员(通事)及官员所记录的 15 世纪旅行见闻的基础上，所撰的《岛夷志略》(海道诸岛屿及诸国地理情况的简要记载，1350)；马欢的《瀛涯胜览》(对海岸的整体概览，1433—35)是现存郑和下西洋基本文献中最著名的一部，但并不是最好的一部。距最后一次航行 90 余年之后，1520 年黄省曾所撰一部历史地理学著作《西洋朝贡典录》(记录了西洋即印度洋国家的朝贡情况)，因其记载最为细致真实，而堪称典范。该书连同另外的旅行见闻录，如巩珍的《西洋藩国志》(记录西洋异域各国情况，1434)；费信的《星槎胜览》(对海外诸国的整体概览，1436，费信与马欢都曾造访印度)对沿海诸国家和地区的基本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反映。巩珍在很大程度上与马欢的论述是一致的，而费信和黄省曾则更多地为我们展现出很多珍贵的资料和有趣的史实，这些是其他著作所不具备的。通过其他的一些记载，我们还可以得到关于 15 世纪早期，印度洋进出口贸易的更加详尽的信息。

3、中国把印度洋称为“西洋”。获得同中国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介入变成了一种力量迅速

¹ 所有的这些论文包括作者对 15 世纪孟加拉与中国之间纺织品贸易的介绍，已由德国海德堡(Heidelberg)大学的南亚学会出版。出版时的标题是《亚洲海上贸易中的商业中心、商品和商人，约 1400—1750 年间》，第 141 号。(斯图加特，1991 年。)

地在东南亚地区发挥影响。这个概念也产生了许多有趣的副作用，值得我们更为详细地研究中国在印度洋的地位。中国将东南亚国家视为其被保护者，有时候甚至视其为封地。比如境外的国家越南。

4、我们已经发现，随着一些小而强大的国家在海岸地区或边界之上出现，中国对次大陆的兴趣也逐渐增强，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5、“纳贡国”体系相对于印度而言，是迄今为止印度学者从未认真加以研究的主题。纳贡国系统与外围国家的本质是不同的。两个主题领域执行政策的根基也截然不同。15世纪的文献资料显然确定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即中国永远不会将印度各邦视为其藩属。

6、根据佛教文献（主要是梵语佛教文献）研究中印关系，极有可能发现迄今为止仍然未知的，却具有启发性的资料，涉及到古代印度及其科学、天文学、医学、历史、语言发展、印度-雅利安语言的语义学、社会-经济状况和许多其他的知识门类。例如，印度北部、西北部、中部和东部的历史地理学在中文记载中可以觅其踪迹。这些记载大多冠以佛教文献之名，而内容是世俗的，关系到印度学的方方面面，如雕塑、文学理论、修辞学、韵律学、音乐等等。

7、有关中国医学的论述大量引自西洋文献，所指的是印度和波斯。但是就其名称和其他一些内容看来，这来源就是印度。这些研究能平息那些对印度之于世界的贡献的质疑。单就音乐来说，就有数百种拉格（ragas，曲调）或被直译或意被译过来，具有了中国化的形式。在接受佛教的同时，中国吸收了这些曲调使其本来就已十分繁荣的音乐学更为丰富。在阐明古代韵律的奥秘和探索印度音乐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大量的辞曲令音乐学家流连不已，比如，在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772—846）的叙事诗《长恨歌》（永恒的情殇）中提到的《霓裳羽衣曲》，我们还曾在其它出处中找到《春莺传》《苏幕遮》，《摩诃》、《兜勒》（mo-ho-dou-lo mahatana or mahagana)¹等神圣美妙的音乐。这个课题非常有趣，云南大学的吕昭义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力图着眼于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应当关注的其他研究方向，并且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原初资料逐渐成为从事区域研究的必要条件。

对现有原始资料的归纳

令学者们最为苦恼的问题就是无法完全掌握现有资料。这大多是由于他们和图书馆及档案文件的管理者之间缺乏沟通。大部分图书馆的检索系统都比较原始和混乱。大多数情况下语言部门的职员既无法为学者提供指引又无法提供中文收藏的详细信息。

因此，汉学家和年轻学者熟悉有关东亚方面专门的图书馆和收藏报告非常必要。其中有德里大学中国与日本研究系、圣地尼克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加尔各答的孟加拉和国家图书馆亚洲文会等。这在本质上来讲，是旨在对中文和中印研究的学生有所助益的初步探索，也意在激发其他相关学者的兴趣。

¹ 这是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是带回来的两首曲子，乐官李延年在其基础上重新创作了二十八首乐曲。——译者注。

中国人眼中的印度

[印度]哈拉普拉萨德·雷易著 蔡晶 译

兼评耿引曾主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
(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印度或者说南亚(从更大的范围来说, 南盟国家)是一个独特的古代文明发源地。但是详实的历史记载非常有限, 尽管麦加斯蒂尼(Megasthenes)、法显(Faxian)、玄奘(Xuanzang)、阿尔贝鲁尼(Alberuni)及其他学者丰富了此类资料; 中文本的《阿育王譬喻(Asokavadana), 也使有关阿育王的资料更为完善, 但是我们仍然甚至难以重构在孔雀王朝宫廷这样一个社会生活中心, 继阿育王统治之后的历史图景。

张骞于公元前 135 年和 130 年出使大夏, 打开了印度东北部与中国的贸易通道。班固(公元 32—92)《前汉书》中的地理学部分记载了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后 1 世纪印度与中国最早的海上贸易历史。除了康泰出使扶南和苏武出使恒河流域国家(匈奴)的著名故事, 玄奘和义净(同属 17 世纪)的纪行以及大量关于佛教及中印关系的记载延续了两千余年, 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早期的西方和日本学者意识到了中国的资料对于研究南亚和东南亚历史的重要性。S.于连(S.Julien)首开先河, 于 1857 年翻译了玄奘的《西域记》, 一批学者继之而来, 也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 如马伯乐(Maspero), 沙畹(Chavanne), 费琅(Ferrand), 梅辉立(W.F.Mayer), 费笠士(G.Phillips), 列维(Sylvain Levi), 伯希和(Pelliot), 高楠顺次郎(Takakusu), 藤山和子(Fujiyama), 山本澄子(Yamamoto)就是其中的几个代表。

东南亚历史大部分通过综合运用中文资料得以重构。由于语言障碍, 南亚历史无法充分利用中文资料。格罗内瓦特(groeneveldt, 《中国史料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历史注记》), 柔克义(W.W.Rockhill, 《通报》, 1914, 1915), 惠特莱(P.Wheatley, 《金岛》及其他著述), 王赓武(《南海贸易》及其他论著), 沃尔特斯(O.W.Wolters, 《三佛齐国的衰落》), 赵令扬(Chiu Leangyeong, 《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 中文), 主要致力于通过中国资料厘清历史线索。相比之下, 密尔斯(J.V.Mills)在他的著作《马欢》(哈克路特学会, 1970)中, 并没有给以南亚相当的重视。一些与印度相关的翻译方面的问题反映了他的弱点。比如, 他将潘都亚(Pandua, 15 世纪孟加拉的首都)误作巴特那(Patna), 将奈纳尔(Nainar)误作纳拉衍那(Narayana), 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主观性的错误。

遗憾的是, 关于印度历史的研究也没有太多的成果。梅辉立(Mayer)在 1874—1875 年间, 仅翻译了 1520 年的一部著作的其中三章, 其中一章涉及到孟加拉。1885 和 1886 年, 费笠士选译了马欢的《瀛涯胜览》中介绍印度与锡兰的海港的部分章节。1933 年, 戴闻达(J.J.L.Duyvendak)在其《马欢再考》中, 再次考证并修订了这些译本。1945 年师觉月翻译了 15 世纪和 16 世纪的一些著作中对孟加拉、德里、斋浦尔的论述。柔克义的翻译最为全面,

但他只着眼于 14 世纪和 15 世纪的三位重要作家，即汪大渊、马欢和费信。

在古人中，有对法显、玄奘和义净的全面译介。在 20 世纪 60 年代，N.C.赛恩编辑了《唐书》（包括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关于印度的一些记载的英文译本，由国际大学出版。这些内容大都已有英文和法文译本。在这些译著中，只有密尔斯是依据校本翻译的。近年来，中国的学者们和一些有声望的出版社，如中华书局，已经出版了一些古籍的精校本，其中包含了关于印度的丰富资料。

1930 年，辅仁大学的张星烺出版了六卷本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该书是从中外史籍中辑录的有关中西往来关系资料的合辑，1979 年以简体字再版），其中包括中国与印度往来的历史。但是这一合辑中的资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官方历史和众所熟知的游记。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于 1991 年和 1994 年先后出版了耿引曾编的《汉文南亚史料学》和两卷本《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汉文南亚史料学》是查阅《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之前的必读文献。耿引曾在其著作中简要介绍了自古以来南亚研究的主要著作、其编者或编译者、以雕版印刷或其它方式第一次出版的时间，并对这些著作中有着重要出处的内容做了一个简要的梳理。她一直从各种耳熟能详的著作和鲜为人知的著作中搜集资料。

该书第一卷汇集了从基督纪元前数世纪至唐朝时期（公元 618—907）的文献资料。第二卷以 1240 页的篇幅，载录了从宋朝（公元 960—1279）至 1840 年的文献资料，包括从 119 部不同命名的著作中摘录的内容，还有二十四史的相关章节。

第一卷不仅囊括了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前后汉朝、三国、南北朝、隋、唐的王朝历史，也收录了一些罕有著作的相关内容。如《博物志》、《西京杂记》、《南方草木状》、《华阳国志》、《水经注》等。与早期张星烺汇编相比，该书共涉及 51 部书目，小号字体印刷，共 548 页。而后者只涉及到 19 部书目，大号字体，共 348 页。此外，该书还有孟加拉、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相关内容。

第二卷涵盖了自宋朝（公元 960—1279）始，继以元朝（1279—1368）、明朝（1368—1644），而至清朝（1644—1911）1840 年以前的所有既有资料，以 1840 年前期的著作，诸如《海录》等终篇。31 部书目之下又有 300 多类词条，内容丰富多样，涉及到政治，地理和社会状况，也涉及到植物群和动物群、药草和经济产品。这一卷共有 345 页，以小号字体印刷，而张星烺的汇编只有 130 页。

由于在形式上被中国化，即便是非常熟悉的名字，在译成汉语后或许就认不出来了。Asoka 被译为阿育王，而 Buddha 被译为佛陀。大部分的佛教人名被翻译出来，而历史性的名词则被区别对待。Gupta 为笈多，Mughal 为莫卧儿，Zo (a) morin 为扎莫林 (Samudi)，Manavikraman 为比里麻，Ibrahim 为易卜拉金（亦不刺金），Ghiyasuddin 为艾雅斯丁，Nasir 为纳丁 (Nading)，Menovans (现为 Menons) 为米纳梵 (Minafan)。著名的孟加拉布料 pachadi、jhamartali 或 jhimbartali 分别为曼摺祇 (man-zhe-di) 和衾白勒褙丽 (qin-bai-le-da-li)。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植物学的术语需要查考。张星烺在其著作中，随处可根据需要界定和解释术语。而耿引曾只是呈现文本，并没有任何注释，如此会使解读该汇编是工作更为艰巨。耿引曾应当将这些术语的解释从张星烺的著作中提取出来，以方便于读者，使他们不必要同时查阅这两部著

作。

就广度而言，这些卷本还应包括其他重要的著作，如《宋会要辑稿》、《大明会典》、谈迁的《国榷》、夏燮的《明通鉴》。这些都是研究中世纪印度历史的信息宝库。例如，《明实录》记载，1412年11月16日，一道皇旨钦差太监特使杨敏带领一支使团前往斋浦尔和德里。这一日期在《国榷》中得到确认。

印度的不少大学已经开设了关于中国语言、文化、政治和中印关系的高级课程。在印度，资料搜集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的两卷文献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印度学者的需求，并鼓励他们去探索这一未被涉足的领域。

附 录

自这篇文章发表以来，已有十余年了。直至现在，只有国际大学（V.B.U）和尼赫鲁大学具有完全资格开设中文硕士和博士课程。在德里大学中国研究还只是作为区域研究课题的一个部分。在此期间，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的不同方面的专门研究。尼赫鲁大学的帕格亚拉克希米（Bhagyalaksmi）博士研究观音（Avalokitesvara）形象在中国的演变；普里亚达希（Priyadarshi Mukherjee）主要从事汉文和藏文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马尼克（Manik Bhattacharya）博士专门从事鲁迅研究；邵葆丽（Sabaree Mitra）博士研究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狄伯杰（B.R.Deepak）博士则选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即1905年—1947年¹中印在民族斗争中的合作。

在德里大学，后来又又有三篇博士论文问世。第一篇是苏玛那斯里（Rev.G.Sumanasiri）的《佛教和儒家思想的相互影响》；第二篇是另一位僧人学者黎公淳（Le Cong Thuan，泰国）所作的《大乘佛教典籍（Saddharama-pundarika-sutra，〈妙法莲花经〉）与巴利部经集（Pali Nikayas）的比较研究》；第三篇是玛塔维（Madhavi Thampi）博士最近完成的《印度人在中国，1840—1947》。除此之外，在德里必然还有一些我们没有提到的学者在从事中国学研究。而在国际大学，没有培养新的博士。

如果没有提到位于新德里萨普鲁之家（Sapru house）的防御研究与分析协会（IDSA）这篇概述便不完整。该协会建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应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事件而建，其研究集中在中国的军事战略和能力 and 对外关系方面。成员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该协会刊行的期刊和时事通讯上。

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属中国研究所的建立是较近时期的发展。该机构成员除了运作《中国报道》，发行东亚研究论文期刊之外，也从事“迈向21世纪的中国”这一项目的研究。

更多的信息，读者可参考戴辛卡（Giri Deshingkar）、黄绮淑和B.K.古玛尔（B.K.Kumar）发表于《印度视界》，印度与中国特刊中的文章。印度文化交流委员会（ICCR），1994年1—3，第495—526页。

¹ 该研究所涉及的时间阶段由译者向狄伯杰教授求证后补充。

【编后语】众所周知，中印两大文明之间的交流历史弥久，季羨林先生说，“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语言和日常生活，中间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等等，在很多方面，无不打上了交流的烙印。”我们熟知中国的印度学研究，至于印度对中国研究情况则知之甚少。现将哈拉普拉萨德·雷易（Haraprasad Ray）的《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概览》和《中国人眼中的印度》刊载于此，以飨广大读者。这两篇译稿的原文均出自哈拉普拉萨德·雷易（Haraprasad Ray）和王树英主编的《亚洲研究》（2007/1-6，第1期）的中印专刊。文章不单是对印度学者研究中国，中国学者研究印度的全面而详实的回顾，更是对未来中印研究的展望和期望。《中国人眼中的印度》综述了中国人研究印度的历史记载。《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概览》则从印度开办“中国语言文学”课程开始综述印度学界的中国学研究。早在1991年中外关系史学会编的《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辑）就登载了哈拉普拉萨德·雷易的《中国学在印度》¹，该文与《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概览》相似，可以说《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概览》是《中国学在印度》的补充和完善，不同之处如下：1、《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概览》分“筚路蓝缕”、“中国佛教和中印文化研究”、“有关现代中国的研究领域”、“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研究成果述评”、“评价”、“一些新的维度”、“对现有原始资料的归纳”七个小节。《中国学在印度》只谈到前三节的内容，而且没有分章节。2、《中国学在印度》列举了设有中文课程的大学或学院、印度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的有关杂志和汉学家名称。3、《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概览》充实了许多新近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印度学者的博士论文情况。4、《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概览》除了综述研究情况外，更重要的是对未来中印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

谭云山文献及研究专栏

【开栏语】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在这历史长河中，如果说古代的玄奘大师给我们开辟了道路，那么近代的谭云山先生所做出的贡献则是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谭云山先生为中印友谊事业兢兢业业达半个多世纪，我们不仅要缅怀他，还要学习他。目前，尽管国内学者早已对谭云山架构中印友好桥梁的事迹津津乐道，但对他的学术思想，优美诗篇却少有深入研究。自2006年起，谭家后人将数百件关于谭云山的文献捐赠给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以作研究之用。鉴此，本刊将自本期起，开辟“谭云山文献及研究”专栏，陆续推出谭云山的学术论著以及学者对这一文献的最新研究成果，旨在踏着谭云山先生的步伐为中印文化交流事业的发扬光大而不懈努力。

¹ 该文是印度尼赫鲁大学中文副教授 H·P·雷易寄给北京大学南亚与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季羨林教授的。文中提供了印度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些情况。原稿一部分是用中文写的，一部分是用英文写的；耿引曾译出英文部分并整理了中文部分，王邦维译出梵文名词，杨瑞琳校改通篇文稿。——引自《中外关系史论丛》，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世界知识出版社，第三辑，1991年，第243页。

观光祖国诗三篇

(照录印度中国新闻报)

序

客冬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先生特别邀请，偕女儿谭文返国观光。既参于国庆盛典，复畅游东北、东南，参观各种建设及游览各地名胜。睹景生情，感怀良多。因口占小诗二十四首，合为三篇。第一篇为“国庆观礼”，志感也。第二篇为“东北参观”，纪实也。第三篇为“东南览胜”，抒怀也。诗似七言切句，但未拘声韵格律。尽随口占来，顺其自然，雅不欲受任何束缚。此抑无宁打油诗之类乎？实乃对于旧诗之一种解放也。其中第一篇，已经北京《光明日报》与印度《中国新闻》刊布。兹略改数字，连同第二第三两篇再行发表，一以略志雪泥鸿爪志之旨意，一以见祖国各种新气象之一斑耳。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作者自志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第一篇 国庆观礼

(一)

一别故人三十年，惊天动地转乾坤；
讴歌颂德遍寰宇，巨像高悬天安门。

(二)

百年大梦起沉痾，今日雄威撼岳河；
引得八方来震旦，兆民欢动齐高歌。

(三)

大炮隆隆响云端，三军严整入广场；
精神抖擞身躯壮，不为侵征为国防。

(四)

人民大队继游行，百万雄师拥上京；
千道光芒齐出现，今朝祖国睹升平。

(五)

劳工领队作先锋，耀武扬威气势雄；
生产年年超额出，掌声雷动祝成功。

(六)

工人之后为农民，生产勤劳亦竞先；
资粮充足且丰盛，礼仪衣食两完全。

(七)

妇女儿童也参加，花枝招展舞婆娑；
气球齐放飘空际，大雨滂沱增彩华。

(八)

文化青年作殿军，百花齐放百家鸣；
媿无如玉生花笔，写尽胸中无限情。

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於北京天安门观礼台上

第二篇 东北参观

(一)

梦想多年东北游，满洲解放归神州；
列车夜半过山海，兴起恁窗观斗牛。

东北自『九一八』为日本侵占，并建立为『满洲国』。至中国抗战胜利，得始解放，复归我神州领域。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夜半过山海关车中

(二)

平畴关外渺无边，大豆高粱遍地横；
粒实盈盈隐约见，人民欢庆丰收年。

车过锦州后，一片平畴，渺无边际。铁路两旁，到处可见大豆高粱横陈地上，盖已割而尚未收取也。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六日由锦州至长春车中

(三)

北京出发到长春，气象万千簇簇新；
文化中区兼实业，汽车制造始完成。

长春在日据时期，为伪满首都。自解放后，我政府积极建设，成为东北文化兼实业中区。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最近建设完成，已投入生产。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於长春

(四)

长春又到哈尔滨，纺织亚麻称盛名；
量具厂兼刀具厂，松花江上好钟情。

哈尔滨为黑龙江省会，在松花江南岸。各种轻重工业，亦极发达。最著名者，为亚麻纺织厂与量具刀具制造厂。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晚於哈尔滨

(五)

工业首区称沈阳，烟囱林立雾翱翔；
机床电缆与风动，更加皮酒人人尝。

沈阳为重工业首区。有机床制造厂，电缆制造厂，风动工具制造厂，与皮酒制造厂，皆驰名全国。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於沈阳

(六)

抚顺煤都冠远东，露天井矿并称雄；
石油加炼汽油出，祖国财源无尽穷。

抚顺煤矿分露天矿与井矿。露天矿一，井矿三。

煤矿上层为油页岩，可炼制石油。由石油再加炼成汽油。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於抚顺

(七)

我国钢都接鞍千，炼钢炼铁早传闻；
无缝钢管最奇特，又喜千山天上天。

东北鞍山号称我国钢都，与千山连接。

千山风景殊胜，最高主峰有『一步登天』与『天上天』奇境。登临其顶，胸怀为之一畅。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於鞍山

(八)

大连风景冠东北，一面海滨三面山；
舰艇机车同制造，玻璃工艺更奇观。

大连有制造公司，可建造各种大小轮船舰艇。又有机车车辆制造厂，可制造各种车辆与车头等等。

大连有两个玻璃制造厂：一为『大连玻璃厂』，专造各种平板玻璃。二为『旅大玻璃制品厂』，制造各种日用工艺品，品质均好。尤以各样各色雕作花瓶极其精巧美观。当作者参观时，一技师正在一大玻璃花瓶上，雕刻印度总统肖像，微妙出神。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於大连

第三篇 东南览胜

(一)

东南名胜古今传，水秀山青称大观；
我爱江山非美女，海河江浙一同参。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由北京赴青岛车中

(二)

燕京出发到青济，邹鲁风光思邈然；
孔孟遗言千百载，大同今日始开端。

由北京出发，先到青岛，次至济南。

大同之说，先民所创，孔孟所传；至今日始发扬光大，而略见其端倪矣。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於济南

(三)

月色朦胧过泰山，苍茫一片又浑圆；
孔林未见意惆怅，宿日愿心那日完!?

二十余年前，曾返国北游，路经邹鲁；原拟登泰山，谒孔林，因地方不靖未果。此次再历其境，亟欲一赏宿愿，又为时间所限未能，怅怅殊甚！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夜由济南赴南京车中

(四)

金陵往昔旧游地，气象如今又更新；
玄武孙陵增彩色，秦淮夜泊却无人。

玄武湖与中山陵皆已重新培修，增色不少。

秦淮河上歌妓游艇，则完全改革；『夜泊』『商女』之业，再不复见闻。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於南京

(五)

人民革命岂容易，火热水深交燃煎；
烈士牺牲无尽数，雨花台上吊英魂。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於南京雨花台

(六)

上海繁华今胜昔，民情风俗更悬殊；
自由平等且亲爱，喋血妖魔尽扫除。

往昔上海，号称魔窟，为一切罪恶渊藪。除外国帝国主义者，暴虐猖狂横行无忌外，走狗买办，野鸡妓女，大盗小偷，扒手乞丐等等，亦暗无天日。今则此等妖魔，一扫而光矣。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於上海

(七)

杭州自昔比天堂，今日杭州更盛昌；
绿化西湖美上美，西湖看罢又钱塘。

杭州西湖，天然风景，本极美丽。昔日诗人，曾比之于美人西子。今地方当局，又加以绿化，在周围山地，植树数千万株，更美上加美矣。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杭州

(八)

游罢东南返故乡，乡音既改鬓毛苍；
天翻地覆乾坤转，且喜三湘增国光。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於湖南株州宾馆